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周必素 李 飞

关键词：贵州 遵义 播州杨氏土司 土司考古

KEYWORDS: Guizhou Zunyi City *Tusi* Remains of the Yang Family of Bozhou Prefecture
Tusi Archaeology

ABSTRACT: In Zunyi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large amoun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tusi* of the Yang Family of Bozhou Prefecture. Since the 1950s, relevant discoveries frequently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ailong Tun Site for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emains of the *tusi* of the Yang Family of Bozhou Prefecture has been greatly advanced: new important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aspects of *tusi* burials, the fortification defense system of the *Tun* (castle) and passes, and the farming economy, showing the uniquenes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usi* remai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trimming of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w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field of “*Tusi* Archaeology” to clarify the special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rules of the *tusi* remains, which is meaningful for the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the *tusi* remains in the Bozhou Prefecture and other regions.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大娄山山脉的中段，境内群山连绵，河流纵横，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历史上遵义长期被称作播州，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以隋牂牁县置朗州，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改朗州为播州，后播州被南诏所陷。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传为太原人的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并开始了其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元明时期，播州杨氏发展成为“贵州四大土司”（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之一。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爆发了“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次年对播州实

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和平越军民府（隶贵州）。从杨端入播到杨应龙被灭，杨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达725年，共传27代30世。

遵义地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在皇坟嘴发掘了播州杨氏第13世杨燧墓^[1]。1972年在高坪发掘了杨文墓（15世）、杨升墓（22世）、杨纲墓（24世）和杨爱墓（26世）^[2]。1988年在团溪清理了第25世“杨辉墓”^[3]，该墓性质存疑，2015年的发掘有了新的认识，详见后文。1998年在新蒲清理了第29世杨烈墓的男墓室^[4]。2012~2014年，对海龙囤遗址进

作者：周必素、李飞，贵阳市，55000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5]。从2013年开始，随着《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除了在海龙囤遗址继续开展全面的考古工作外，一方面对养马城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和团溪杨辉墓及其墓祠等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勘测和发掘，另一方面还对

涵盖现今遵义县、红花岗区、汇川区、新蒲新区等范围的古代播州核心区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获得大量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取得了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的重要进展（图一）。以下主要对近年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取得的新发现和 new 认识进行系统梳理。我们还尝试提出“土司考古”课题，目的在于拓展思路，力图在今后将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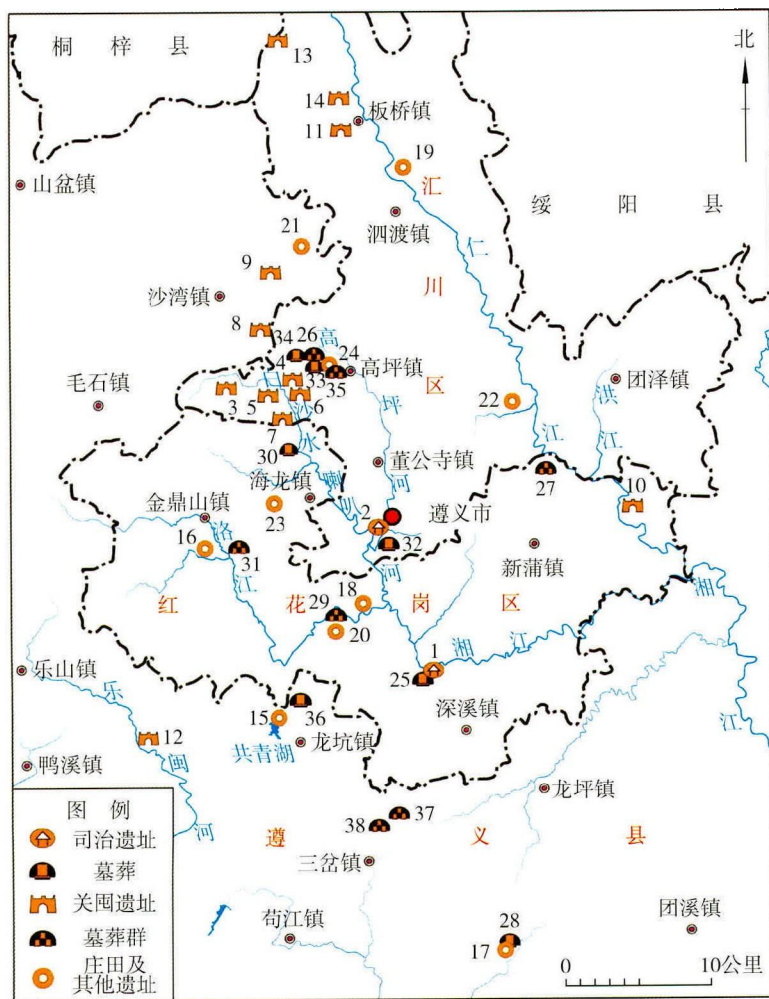
州杨氏土司遗存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纳入全国“土司考古”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目前在遵义地区发现大量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司治遗址、关围遗址、田庄堰塘遗址等三类。

（一）司治遗址

据文献记载，杨端入播时“径入白锦，军高摇山，据险立寨……，为久驻计”^[6]。到12世杨珍主播时，因为“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7]。由此来看，杨氏治播期间可能存在早晚两个政治中心，其中晚期司治穆家川，据考证即为现今遵义市中心城区所在地，但早期治所白锦堡的地理位置至今仍不能准确认定。

地处红花岗区深溪镇平桥村的皇坟嘴，位于遵义城区南约10公里处，湘江于此形成一个环形半



图一 宋明时期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分布图

1. 白锦堡遗址 2. 穆家川遗址 3. 海龙囤遗址 4. 养马城遗址 5. 养鸡城遗址 6. 养鹅池遗址 7. 望军囤遗址 8. 龙爪囤遗址 9. 海云囤遗址 10. 青蛇囤遗址 11. 水牛城遗址 12. 乐阆城遗址 13. 娄山关遗址 14. 点灯山遗址 15. 太平庄（大水田）遗址 16. 菱角堰遗址 17. 雷水庄（雷水堰）遗址 18. 千工堰遗址 19. 永安庄遗址 20. 桃溪庄遗址 21. 养牛庄遗址 22. 云台衙院遗址 23. 仙岩庄遗址 24. 鸣庄遗址 25. 杨黎墓 26. 高坪杨氏土司墓地 27. 新蒲杨氏土司墓地 28. 杨辉墓 29. 桃溪寺墓群 30. 海龙坝官坟 31. 四衙村石室墓 32. 干田坝大墓 33. 杨忠勇墓 34. 兰家沟杨氏墓 35. 笔架山杨氏墓地 36. 杨子墓 37. 穆家田罗氏墓地 38. 扬州湾罗氏墓地

岛,杨燾墓即坐落在其上。墓葬后方有城墙遗迹,墓前缓坡阶地上发现建筑基址残迹,墓室前还曾出土过瓦当、筒瓦、板瓦、陶水管、石柱础等建筑构件。结合杨燾墓志铭文中“葬于本堡”^[8]等相关记载,初步推测杨燾墓所在地可能与白锦堡相关。

晚期司治穆家川可能叠压在现今遵义城区下,踪迹难寻。经过对残存的遵义旧城城墙进行解剖,其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最早可到明代^[9]。但明代平播之役后,播州司治又成为遵义府城所在,目前尚不清楚残存的城垣与播州司治的关系。

目前暂可推定的播州杨氏早、晚期司治所在地,皆临湘江,地势平缓,水陆交通较为便利。从杨端入播的早期治所白锦堡,到12世杨轸向北迁治穆家川,总体看政治中心是由隘陋之地向开阔地带转移,规模由小到大,这是杨氏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献中对播州宣慰司司治格局的记载^[10],可知杨氏“筑龙岩新城(海龙囤)”等山城时,在相当程度上参照了司治的建筑格局。

(二) 关围遗址

关围遗址主要分布在以海龙囤为核心区域的周边山巅。目前除重点对海龙囤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勘测和大规模发掘^[11]外,还对养马城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查与局部保护性清理^[12]。其他遗址则大部分仅作过考古调查和测绘^[13]。海龙囤、养马城皆始建于南宋晚期,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进行大规模扩张和重建。其他关围作为海龙囤的“羽翼”,大多也应主要修建于杨应龙时期。现择其重要者简略介绍。

海龙囤遗址 位于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遗址现存城垣总长5773米(含“新王宫”院墙477米),所围合的面积近38万平方米。其中,囤顶“大城”南、北城垣为南宋时期遗存,应即杨文为抗蒙而建的“龙岩新城”之一部分。东西两端现存的关隘及与之相连的城垣,以及“新王宫”等遗址,应

该是末代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年间“重建”。

“新王宫”遗址位于囤顶中央偏西处,是一组四周有封闭围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中路建筑自前而后逐级抬升,依次为中央踏道、大门、左右转角楼、仪门及左右两厢、庭院及中央甬道、月台、大堂、两厢及庭院,末端为二堂,形成三进院落的空间格局。

养马城遗址 位于海龙囤东面2.5公里处,地处数个小山头围合而成的山间盆地中,平面呈不规则形,现存城墙周长3500米,城内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发现城门6座,多设于山间垭口处,有叠涩顶和拱券顶两类。城内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豪高坡南部的衙门、张家城门内的观音殿及东门内侧三个区域。经勘查和局部清理,“衙门”遗址大致始建于宋,明代扩建。

养鸡城遗址 与养马城隔白沙水相望,相距约600米。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城墙周长860米,城内面积约1036平方米。城址的西、南、北三面城墙保存较为完整,残高2.5~5米。发现城门2座,砌筑为叠涩顶,一座城门已坍塌,另一城门残高2.4、宽1.2米。

养鹅池遗址 西北距海龙囤约3.5公里。残存的城墙高1.5~3米,中间有断隔。南北两侧各有一门,北侧城门宽2.1、残高2.2、进深1.3米,南侧城门已毁。

望军囤遗址 位于养鹅池遗址西南不远处“望金村”。遗址整体上平面略呈方形,城墙周长800、高3.5~4米,城内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西侧城墙中部发现一座方形平顶城门,城门现存高3.9米。

龙爪囤遗址 位于遵义县沙湾镇沙湾村,由反背寨、马山寨、寨上寨、羊窝寨、大佬山寨共五囤组成,平面分布如龙之五爪。反背寨关围呈不规则圆形,城墙周长约375米,城内面积约6700平方米,城墙宽约2.3、残高约3米,现存南、北两座城门。

青蛇囤遗址 位于新蒲新区中桥村,由

白蛇营、金狮营、彭家营组成。各营大小不一，但都保存有城墙、城门等。

乐闽城遗址 位于遵义县鸭溪镇，地处乐闽河左岸山上。城址环山而建，面积较大，城墙仅北部与东部保存较好，原有城门4座、旁门3座，现遭破坏仅存2座。

上述以海龙囤为代表的关围山城，皆设在较为险峻的山巅，用于聚集兵力与粮草。其中地势于诸囤中最为险要、规模最大的海龙囤，则成为播州杨氏土司关围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后的据点，是“保固之根本”。海龙囤周围“尚有龙爪、望军、海云等囤，养马、养鸡等城，皆海龙羽翼”^[14]，形成“以海龙囤为老囤，以四围边界扎子囤，酋居中调度”^[15]的格局。散布在海龙囤及养马城周围的关围山城，从各个不同方向对土司的司治形成拱卫之势，山城与平原城配合使用，构成播州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

（三）田庄堰塘遗址

田庄，亦称庄田，是播州杨氏的经济基础。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杨氏在成化年间计有“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园二十六处、蜡崖二十八处、猎场一十一处、鱼潭一十三处”，庄田之载其名者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囤平、大足、黄鱼、永安、先峰、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水、桃溪、半山、泥川、海龙坝、干溪、会川、朗山、孝义等庄”^[16]。目前通过考古调查确认与庄田相关的遗址包括庄宅、堰塘等^[17]，分布在今遵义县龙坑镇、团溪镇、松林镇、沙湾镇，红花岗区金鼎山镇、南关镇、海龙镇，汇川区团泽镇、高坪镇、泗渡镇等广大区域。庄宅大多应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堰塘则很多沿用至今。现择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太平庄遗址 位于遵义县龙坑镇，应即文献所记的“大水田”。坝下现存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的“万世永赖碑”，碑文有“粤嵒大水田堰，肇自唐时，……命修四十八庄，

此系太平一庄”等语。太平庄大致应毁于明万历年间平播时期。

永安庄遗址 位于汇川区泗渡镇观坝村仁江东侧。庄宅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围墙，南、北、西三面围墙保存较好。南、北两侧墙间距98米，东、西两侧墙间距147米，现存面积约15000平方米。

养牛庄遗址 位于遵义县沙湾镇连阡村衙院组。庄宅遗址依山坡地势共分五级，有踏步相连。遗址东西长约123、南北宽约91米，现存面积约6700平方米。地表可采集到砖、瓦、脊兽等遗物。

鸣庄衙院遗址 位于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遗址四周原有土墙，平面大致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93、东西宽约102米，现存面积约19700平方米。

菱角堰遗址 位于红花岗区金鼎山镇银江村。由小堰与大堰组成，现存小堰，大堰已被开垦成农田。在小堰南、北侧均有土台遗址，北侧土台的西、北侧均发现石砌台基遗迹。

千工堰遗址 位于红花岗区南关镇南山村檬庄组的蚂蚁河上。堰侧现存清乾隆年间所立“重修千工堰功德暨用水条规碑”，碑文云“有千工堰创修于明季，迄今二百余年”。堰南约300米处发现一处明代建筑基址，可能系庄宅遗迹。

庄田是播州杨氏土司的经济命脉，设于庄田内的庄宅，又称庄所、庄院或衙^[18]，应是庄田的管理机构，《遵义府志》记宣慰使同知罗氏曾“分其庄宅为十，曰‘十衙’，今其地犹此称”^[19]。一些庄宅规模较大，装饰豪华，可能也兼作其他用途，如桃溪庄在明代成化年间为杨辉妾贯氏所居^[20]，茅衙则传说为杨应龙妾田雌凤所居。

二

在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中，墓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已清理发掘并确认了9座杨氏土司墓葬，分别是杨燧墓（13

世)、杨价墓(14世)、杨文墓(15世)、杨铿墓(21世)、杨升墓(22世)、杨纲墓(24世)、杨辉墓(25世)、杨爱墓(26世)、杨烈墓(29世)。其中,近年最重要的新发现是对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和团溪杨辉墓地的全面清理发掘。除上述土司墓葬外,通过调查还新发现杨氏家族墓4座、播州宣慰使司同知罗氏家族墓地两处,以及数处疑似土司墓的大型石室墓。

(一) 杨氏土司墓

新蒲杨氏土司墓地 位于遵义市东北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地处乌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旧称洪江)西岸临江缓坡地带,是由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合葬墓、第21世杨铿夫妇合葬墓、第29世杨烈夫妇合葬墓共同组成的布局较完整的一处墓地。杨烈墓发现较早,双室并列,墓室前方残存石翁仲、拜台及墓碑等遗迹。2012年,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一座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2013年对该墓进行发掘,确认系杨铿及其两位夫人的合葬墓^[21]。根据杨铿墓志提供的线索,2014年在杨烈墓西北侧约10米处新发现了杨价夫妇合葬墓。与以往发现的杨氏土司墓葬皆为大型石室墓不同,杨价墓是一座带墓道、双室并列的大型土坑木椁墓,墓室之间有宽约2米的生土隔梁;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出土了较多随葬品,包括一定数量的金银器。在整个墓地的北侧还发现有一处明代建筑遗址,推测有可能是墓地所葬某一位土司的墓祠遗迹^[22]。

杨辉墓 位于遵义市南约50公里的遵义县团溪镇雷水堰。整个墓地布局规整,围绕墓葬有一“凹”字形墓园,四周有垣墙,自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发现墓园门址、四级建筑平台遗迹、M11、墓碑和M10^[23]。M11为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从发掘结果可以确认是播州杨氏第25世土司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的合葬墓,在墓葬后侧立有杨辉夫妇的三通墓碑。M10位于墓碑北面,是一座单石

室墓;此墓与M11关系密切,其性质尚待进一步探讨,目前初步推测有可能是杨辉墓的“疑冢”或“风水冢”。

(二) 疑似土司墓

在杨价墓前方,还发现有3座大型石室墓,墓室结构和墓内雕刻较杨价墓简单。1985年在其中一座墓旁发现墓志盖及残碑,此碑系播州杨氏第27世土司杨斌为其夫人所立。2000年对杨价墓进行维修时,又在其北侧发现一龟形石盒,盒内出土一方买地券^[24]。从出土的残碑、残墓志和买地券推测,上述三座大型石室墓中有一座可能是杨斌夫妇合葬墓^[25]。

桃溪寺墓群 位于遵义市西南约3.5公里处,共发现墓葬3座,1985年对其中的M2进行过抢救性清理^[26]。M2墓室四壁雕刻有仿木结构房屋建筑、武士、四神及花卉等图案,应属于宋墓。M3墓壁和顶部刻有“寿山福海”四字,墓葬形制具有元墓的特点。结合传世文献“杨汉英神道碑”所言杨汉英“葬于桃溪祖域之东”^[27]的记载,我们怀疑M3有可能是播州杨氏第17世杨汉英的墓葬,时代偏早的M2则可能是杨轸(12世)或之前的某位杨氏先祖墓。

除此之外,还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海龙镇新龙村、四衙村以及汇川区上海路街道办事处航宇社区等地,新发现数座被当地村民称为“官坟”或“皇坟”的大型石室墓,墓葬规模与墓室结构等接近高坪明代杨氏土司墓,也有可能属于土司墓葬。

对上述“疑似土司墓”性质及墓主身份的确认,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和深入研究。

(三) 杨氏家族墓

杨忠勇墓 位于汇川区高坪镇珍珠山黄秧嘴,为双石室墓,墓室规模较小,墓内发现一方镇墓券,据此推测墓主可能为杨忠勇夫妇,年代大致在元代晚期^[28]。

杨铿祖父和父亲墓 位于汇川区高坪镇

笔架山，西北距高坪珍珠山杨氏土司墓地约1500米。发现的两座墓葬均为双石室夫妻合葬墓，20世纪50年代已被破坏，墓内出土有金龙、银盆、玉牌等遗物，墓前残存有墓碑三通。据碑文推知此两墓的墓主可能是杨铿祖父杨如祖和父亲杨城。杨铿的土司职位袭自其族侄杨元鼎，其祖父杨如祖和父亲杨城均不是土司。

杨子墓 位于遵义县龙坑镇牌坊院子，墓室早年已被破坏。2002年5月，基建施工挖出残存的石棺床和腰坑。腰坑内放置有镇墓券、买地券、四神（金龙、银虎、金朱雀、银玄武）、银钵、铜锣等，据买地券可知墓主为“大明国四川道播州居冠带官杨公子”，墓葬年代为明弘治十四年^[29]。

杨爱女儿墓 位于汇川区高坪镇中学后侧，西北距高坪杨氏土司墓地仅约300米。墓葬为规模较小的三石室墓，墓前发现祭台、残墓碑等。碑正中刻篆书铭文“明故仲女恭从杨氏之墓”，右侧上款刻“大明正德元年岁在丙寅七月八日”，左侧下款刻“孝父杨爱立石”。墓室棺床下发现有石质腰坑，坑内放置1件荷叶盖银钵，内放四神，钵口沿刻有八卦符号^[30]。

（四）罗氏家族墓地

据相关资料，罗氏家族长期世袭播州宣慰使司同知一职，作为播州杨氏土司的副手，与播州杨氏的兴衰相始终，在播州历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目前在遵义地区发现的罗氏家族墓地有两处^[31]。

穆家田墓地 位于遵义县龙坪镇中心村穆家田北侧的罗家坟山，共发现4座墓葬（编号M1~4）。各墓的建筑结构和墓室雕刻图案等与高坪杨氏土司墓大体相同，但墓葬规模缩小了近一半。M3前发现残墓碑一通，可见篆书残铭“荆口（此两字横向并列）氏之墓”，结合文献，推测可能为明初播州宣慰使司同知罗琛之墓。M2前约5米处立有青石墓碑一通，上部已残，仅见“罗公

之墓”四字。M1左室后壁雕有一龙双鱼图案，龙在上，双鱼在下跃出水面；墓前约5米处有两通残碑，左侧碑中间竖向阴刻篆书铭文“□同知致仕靖夷罗公之墓”，两侧楷书题款，左侧残文“□季冬初一”，右侧残文“□州宣慰使司同知宏立”。

扬州湾墓地 位于遵义县三岔镇红光村寺坎组，共发现墓葬7座。分布在李师堰（M1、M2）、杉树坝（M3、M4）、玉塘庙（M5）、大林（M6）、台湾邨（M7）等地。墓葬形制、大小等与穆家田罗氏墓群接近。部分墓室后壁雕刻团花或团花几案，墓顶正中有圆形凿孔，凿孔四周雕刻卷云纹。在大林发现的墓葬（M6）出土有墓志一方，墓主为罗友忠，下葬年代为元大德十年（1306年）。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如果对前文所列“疑似土司墓”的推论可以成立，则在播州杨氏家族的世系中，自南宋晚期的杨粲到明代后期的杨烈，大多数土司的墓葬已被发现或清理发掘，这为全面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而其他杨氏家族成员墓、土司属吏如罗氏家族墓地等的相继发现，也为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权体系、治下不同层级的人员组成和社会结构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

依据上述资料，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我们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取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第一，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土司司治遗址中，湖南永顺老司城^[32]、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33]等开展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其司治的总体布局和衙署建筑等基本清楚。对于播州杨氏土司而言，其早期司治白锦堡，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勘探，推测可能就在杨粲墓所在地，但因还未正式发掘，城墙与建筑等遗迹的关系尚不能确定；而晚期司治穆

家川，几乎全被现今遵义城区所叠压或遭破坏。不过从目前的发现来看，播州杨氏土司除在地势低缓之处建有“平原衙署”外，还在周边地势险峻的山巅修筑了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大规模发掘以及养马城“衙门”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这些山城内也都有衙署性质的大型建筑群。这些体现土司政权的建筑群都具有我国古代传统的大型官署的建筑特征，如中轴线对称、大堂居中、前堂后室的布局等。从养马城到海龙囤衙署建筑的形制变迁来看，这些特点越往后表现得越明显，这对今后勘探和发掘白锦堡或穆家川等平原土司遗址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二，完善的关囤山城防御体系和田庄庄宅，是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比较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类别。杨氏入播之初，即“径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寨”^[34]，选择的便是山城。此后，随着势力的逐步拓展，开始在平原地带营建城池，但并未放弃对山城的经营。13世纪中叶，随着蒙军逼近，播州杨氏第15世杨文曾向四川制置使余玠条陈“保蜀三策”，余玠取其中策，即“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柢”^[35]。不久，杨文又与两府御使吕文德议定“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36]，此即为海龙囤建城的开始。根据播州杨氏“寓兵于农”的经营策略，活动在囤上的兵卒平时可能也要到山下的庄田耕作，这也深刻体现了土司制度“世有其土，世有其兵”的特点。

第三，通过对杨价墓、杨烈墓等墓园建筑遗迹和所出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杨价墓的墓园建筑特征与海龙囤、养马城内保存的南宋晚期建筑遗存接近，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同时代特征；而杨烈墓的墓园建筑特征与海龙囤、养马城发现的明代中晚期建筑遗存接近，也具有明显的共时关系。海龙囤、养马城等兴建于南宋晚期，明代中晚期又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扩建，

与南宋晚期抗蒙战争以及明代中晚期杨氏土司同中央王朝矛盾激化的背景有关。从考古资料的层面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海龙囤、养马城等防御性山城的城墙和城内布局的变迁，与宋元明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第四，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不仅远离当时的司治衙署，而且并不是集中分布。尽管第13世杨粲墓（可能还包括第27世杨斌墓等）所在的皇坟嘴，据推测或许是播州早期司治白锦堡所在地，但它应该是司治衙署等被废弃后再作为土司墓地使用。相反，在已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中，皇坟嘴杨粲墓、新蒲杨氏墓群、高坪杨氏墓群、雷水堰杨辉墓等，均选择在杨氏庄田近旁的山麓上，反映出墓葬与田庄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这可能体现出土司与田庄之间的所有权关系。这种情况，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的土司墓地集中分布在衙署附近，墓葬同衙署关系异常密切的布局方式不同。

土司墓葬与田庄的直接关联，可能还与当时的墓葬祭扫制度有关。在已发掘的杨氏土司墓葬中，第25世杨辉墓附近有规模宏大的墓祠，杨烈墓旁可能也有墓祠或家庙之类建筑。在杨粲墓前方，经勘探发现有建筑基址和两尊圆雕石人坐像，还出土瓦当、筒瓦、地漏等建筑构件，以及圆雕石人和马的残件^[37]，这些都表明存在墓前建筑的可能性，或许与杨氏家庙有关。杨价墓正前方的墓园垣墙处保存有方形门址、杨辉墓的墓园中轴线上也发现建筑基址，也都可能存在墓外的祭祀性建筑。这些祭祀设施平时应该有人看守，并在岁时祭扫，所需费用可能即是由庄田供给^[38]。

第五，通过对杨氏土司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尤其是对墓葬、墓园、墓祠加以整体考察，可以看出播州杨氏土司在墓地的选择和布局上有一定规律，而且颇具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土司专地

入葬。目前发现并确认的9座土司墓葬，分布在远离司治的四处墓地中。这四处土司墓地中，除高坪墓地在杨文墓前有一座明代小墓外，其余皆没有发现其他墓葬。（2）墓地应该有完整的规划。墓园内包括垣墙、园门、祭祀性建筑、墓碑、墓室和高大的封土等，有的墓室前方还有神道、石翁仲等。除墓园外，附近可能还有墓祠。（3）墓葬形制大多数为大型土坑石室墓，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杨价墓）。但无论石室墓还是木椁墓，男女墓室均各自独立，大小及结构则基本相同，有并列的两室、三室或四室之分。两墓室者按男左女右排列，三墓室者按男墓室居中、女墓室分列两侧的方式排列，左侧或中间墓室位置略高或略显宽大，突出其主体或核心地位。（4）每个墓地一般分布有数座土司墓葬，例如新蒲墓地位有杨价墓、杨铿墓、杨烈墓；高坪墓地分布在相邻两个小土梁上，一个土梁上为杨文墓、杨纲墓，另一个土梁上为杨升墓、杨爱墓；皇坟嘴杨粲墓地的墓园、墓前建筑遗迹等因遭到破坏已不清楚，但墓旁发现有杨斌夫人墓碑和其他三座明代大型石室墓，表明该墓地至少存在两座以上的土司墓葬。（5）分布在同一墓地的土司墓葬，墓主之间大多不是父子等特别亲近的关系，甚至一个墓园内的墓葬也不是父子关系。例如新蒲墓地中杨价墓（14世）和杨烈墓（29世）的墓园基本重叠，高坪墓地则是杨文墓（15世）、杨纲墓（24世）共有一个墓园，杨升墓（22世）、杨爱墓（26世）也共有一个墓园。以上共用同一墓园的几组土司墓，墓主都相隔数代。出土的杨铿墓志明明确记载，杨铿死后第二年其子杨升“祔葬先人于洪江原左，威灵英烈侯墓之右”，可知杨氏土司的确有祔祖而葬的情况。但祔葬于杨价墓旁的杨铿墓，并没有安排在杨价墓园内，杨铿墓本身也没有发现墓园遗迹。而多数祔葬于先祖的土司，如杨纲、杨爱、杨烈等就直接

安葬在先祖墓园内。同葬于高坪墓地的杨升（22世）、杨纲（24世）虽系父子，但按照祔祖而葬的原则，也就被分隔在两个不同的墓园内。

第六，杨氏土司墓葬及其家族成员墓、属吏墓，在墓室结构、墓内雕刻和随葬器物等方面，与川渝地区的宋明时期石室墓基本相同，同其他地区的宋明时期土司墓也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可以纳入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加以比较研究。至于使用土坑木椁的杨价墓，是出于某种原因出现的偶然现象，还是表明杨氏土司可能采用过另外一种墓葬形制，尚需通过更多土司墓葬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加以判断。从已清理的大型石室墓的情况看，土司墓葬基本上采用前堂后室的布局，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仿照房屋建筑形式向箱框式发展，前室逐渐变小甚至消失，墓室内雕刻也逐渐简化直至消失。但从早到晚，墓底使用腰坑的葬俗一直保留，腰坑内放置的器物除杨粲墓为铜鼓外，大多数以四神和买地券为主，体现出比较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

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虽已取得若干重要进展，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早、晚期司治的准确位置、关围山城防御体系和田庄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目前都还不是非常清楚。土司墓葬虽已发掘了9座，但大多集中在南宋晚期至明代，南宋晚期之前的墓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杨氏家族成员墓、属吏墓等也有发现，但开展的具体考古工作不多，杨氏土司治下的社会层级关系还不甚明了。今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仅要逐步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与贵州其他土司遗存以及邻近省区的相关遗存进行对比，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加以考察，以揭示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等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的历史。

四

随着各地土司遗存考古工作的深入开

展,特别是贵州遵义海龙囤、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三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获成功,对土司遗存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和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提出“土司考古”的课题应该是顺理成章,对于进一步推进相关领域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名思义,土司考古所指应该主要是以土司及同时期相关遗存为对象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即用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与土司相关的遗迹、遗物的揭露和研究,阐明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土司考古的时间范围不仅包括广泛推行土司制度的元明时期,往前可追溯至唐宋实行羁縻统治的时期,向后则可延续到清至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残留阶段。因为土司通常实行世袭家族统治,其历史往往并不是随着朝代的更迭而结束。

土司考古的核心范围主要是在曾经较广泛推行土司制度的我国西南及邻近的鄂西南、湘西、桂西北等地区,往北还可延伸到西北乃至东北等实行过土司制度的广大区域。据相关研究统计,明朝在全国14个边疆民族省区共设置土司(土官)3108家共2万余人^[39],他们的活动所留下的各类遗存都应该属于土司考古的重要对象。

土司制度盛行的元明清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书等资料较为丰富,而且相当多的土司遗存就直接暴露于地表。因此,土司考古既离不开地层学和类型学等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也离不开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只有通过田野考古与文献研究相互印证,才能逐步将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内涵揭示出来。

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土司考古有以下特点。第一,土司遗存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依俗而治”这种管理制

度的产物,既体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文化个性。第二,遗存普遍埋藏较浅,有的直接暴露在地表,部分地面建筑及雕刻等遗迹保存尚好,工作易于开展,并能从整体上辨识或把握不同类别土司遗存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第三,作为较晚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有大量的历史文献甚至口碑传说可供参考,能够与田野考古资料互为印证。第四,土司遗存是多民族活动的遗留,反映了所属民族各自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可与民族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开展研究。第五,土司遗存在文化形态上有着与中原文化的趋同性,体现出边疆民族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逐步认同,以及我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逐步形成的过程。

提出“土司考古”的课题,其意义在于既强调文化的共性特征,又体现各地域土司遗存的个性。因为土司制度的核心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推进土司考古的相关工作,可以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 释

- [1]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杨燊墓发掘报告》(初稿),1965年油印本。本文涉及杨燊墓的资料,未经注明者均来源于此。
- [2]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 [3] 刘恩元:《遵义团溪明播州土司杨辉墓》,《文物》1995年第7期。
- [4] 赵小帆:《遵义杨烈墓清理简报》,《贵州文物工作》2002年第3、4期合刊。
- [5] a.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b.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海龙囤文化遗产管理局:《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城垣、关隘的调查与清理》,见本刊本期。
- [6] [明]宋濂:《杨氏家传》,见《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一第9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 [7] 同[6]。

- [8] 同[1]。
- [9]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田野考古资料。
- [10]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第94页，中华书局，1985年。以下涉及本书，版本均同。
- [11] 同[5]。
- [12]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贵州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见本刊本期。
- [13] 本文所涉及关围遗址的资料未经注明者，均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度考古调查成果。
- [14]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第140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
- [15] [明]杨寅秋：《临皋文集》卷四第58页，见《四库全书·集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16] 《勘处播州事情疏》第21、36、41、59、66、75页。
- [17] 本文涉及田庄堰塘遗址的资料，均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度考古调查成果。
- [18] 据《平播全书·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复视其大水田庄宅制度，台沼亭榭，僭越非常”，“大水田、永安庄、桃溪衙，皆贼所为世修庄院”，即使用了“庄宅”、“庄院”或“衙”等名称。而《勘处播州事情疏》则提到“干溪庄所”、“会川庄所”，用的是“庄所”这一名称。
- [19] [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第605页，巴蜀书社，2013年。
- [20] 《勘处播州事情疏》第52页。
- [21]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贵州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墓》，见本刊本期。
- [22] a.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b.周必素、彭万：《遵义新蒲村杨氏“土司”墓地》，《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 [2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见本刊本期。
- [24] 资料现存于杨燊墓博物馆。可参见周必素：《杨燊墓发现买地券》，见《古播遗踪》（一），黔新出（图）内资字第874号，2002年。
- [25] 周必素、白彬：《贵州遵义杨燊墓附近出土买地券的年代与性质》，《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
- [26] 张定福、万光云：《遵义桃溪寺宋墓》，《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2期。
- [27] [元]袁桷：《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见《清容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年。
- [28]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考古调查资料。
- [29]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播遗踪：播州杨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第92~9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
- [3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
- [31] 罗氏墓地是2014年考古调查的新发现，资料现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3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考古》2011年第7期。
-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 [34] 同[6]。
- [35] 参见注释[2]“附录”所引“杨文神道碑”。
- [36] 同[35]。
- [37] 相关资料现存于遵义市杨燊墓博物馆。
- [38] 播州杨氏墓葬中尚未发现涉及守墓制度的材料。但在遵义高坪发现的万历十年（1582年）“张氏祭田记”碑，记载了杨应龙之母为随其出嫁的何氏购买水田，以其所收之租供岁时祭扫之事。碑文记载，“吾□母请命于先君镇国公，遂将竹垭庄抵六赎券，太夫人□以庄所人之租不足以充祭扫□费，又自出价银置买任村七跳水田，二□□□成礼田，去高平二三里许，通计田二□余垧地，于是岁时祭扫□□，告贾之三庄共□□□石玖斗柒升叁”云云。此碑现藏于遵义县文物管理所。
- [39] 龚荫：《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十个问题》，见《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第51页，岳麓书社，2014年。

（责任编辑 杨 晖）

本期要览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城垣、关隘的调查与清理 2013~2014年,对海龙囤遗址的城垣及关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绘与试掘,基本厘清了遗址的整体布局及时代变迁。囤顶“大城”南北城垣、“土城墙”及其门址应属南宋时期遗存。现存的铜柱关、铁柱关、飞龙关、飞虎关、朝天关、飞凤关、万安关、西关、后关及与它们相连的城垣主要为明代万历时期遗存。

贵州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2014年,对养马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绘和试掘。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保存的石砌城垣长约3500米,发现城门6座。在城址南部的“衙门”遗址发现长方形院落及相关建筑遗迹,其西北面还有1处采石场。养马城主要应为播州杨氏土司营建,其兴废过程与宋蒙战争及明代平播之役关系密切。

贵州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墓 2013年,对明代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杨铿夫妇合葬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三室并列的长方形石室墓,墓室结构基本清楚,残存的骑马俑形象生动。该墓的发现,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为认识当时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出土墓志为研究播州杨氏的历史及与周边土司的相互关系等提供了新线索。

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 2015年,对明代播州杨氏第25世土司杨辉墓进行了发掘。根据出土墓志,确认三室并列的长方形石室墓M11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的合葬墓。墓中残存大量陶俑残片,腰坑中发现保存完整的四神及买地券。此次发掘厘清了整个墓园的布局及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为探讨播州杨氏丧葬习俗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在土司墓葬、关围防御体系和田庄遗迹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许多新进展,突显出土司遗存在宋元明时期考古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提出“土司考古”的课题,对于阐明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全面系统地推进播州和其他地区土司遗存的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